

〈音樂臺北——建城百年的歷史迴響〉，《音樂藝術》（上海：上海音樂學院）2006年第1、2期：98-103、99-103。又收入《音樂臺北 vs. 音樂上海：音樂文化對照記》《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8月）頁317-340。

〈音樂臺北——建城百年的歷史迴響〉

國立臺灣大學

音樂學研究所

沈冬

摘要

去年初夏，天氣微暖，一部紀錄臺灣流行音樂的影片——《跳舞時代》吸引了社會大眾的目光，引起臺灣廣泛的討論。這部紀錄片透過音樂人李坤城收集臺語歌謠老唱片的過程，引領觀眾步入七十年前臺灣的音樂時空。手搖留聲機的唱針磨刻著古老的七十八轉賽璐珞唱片，傳出來的是1933年的臺語流行歌曲〈跳舞時代〉（陳君玉詞、鄧雨賢曲，純純演唱），青年男女隨著「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的歌聲，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這部影片透過臺灣第一代流行歌手——愛愛的口中，娓娓「唱」出三、四十年代臺灣的音樂生活。以歌聲舞影、燈紅酒綠的都市流行文化為表象，影片再現並重構了一個有電燈、電話、自來水、電影、唱片、留聲機，女性的現代臺灣。這部影片不論資料蒐集或敘事觀點都具有相當啟發性，但也容有進一步觀察討論的空間。本文正是由此觸發，嘗試探觸清領至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政經文化中心——臺北的音樂文化。

臺北建城始於清光緒5年（1879），成於光緒10年（1884），本文的論述擬集中於臺北建城以後、日治時期（1895-1945）為主，但為拓展歷史縱深，首先討論了臺北建城以前臺灣漢人音樂概況，其次敘述日治時期臺北音樂文化的幾條發展主脈，最後試圖就臺北的音樂文化提出若干思考與論證，由文化傳播的角度，探討較少為人所注意的城市之間的相互影響，亦即臺北與上海之間音樂交流的現象。

自明鄭以來，臺灣音樂活動多半依附於戲曲表演之上，而戲曲表演又與祭祀活動密不可分。最著名的記述如康熙間來臺採硫的郁永河所謂：「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紅唇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裨海記遊》）又如首倡建臺北城的沈葆楨評臺地風俗曰：「臺俗信鬼，演劇迎神，殆無虛日。」（〈為福建撫臣王凱泰請卹摺〉），自臺北建城以後，由清領入於日治，隨著都市經濟的開發，臺北的音樂活動也日趨多元。或形容臺北「歌樓舞館，幾乎無家不是。俗重生女，有終其身不嫁以娼為榮者。」（池志徵《全臺遊記》）以戲曲活動而言，自光緒十七年（1891）唐景崧招上海京班來臺演戲，「海派京劇」風行於臺北，乃至於勾欄藝姐也習染風氣，無不妙擅「京調」。有關於艋舺、大稻埕一帶音樂及戲曲活動，如藝姐、車鼓、歌仔、褒歌……在連雅堂及其他文人筆下時有所見。

教會是西方音樂進入臺灣的最早媒介。日治時期，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即今市立師院）的張福興是臺灣第一位赴日專攻音樂的人，此後留日音樂家接踵繼出，他們日後大多從事於音樂教育，對臺灣早期的音樂教育有積極貢獻。

臺灣最早的臺語流行歌曲是 1932 年的〔桃花泣血記〕（詹天馬詞、王雲峰曲），《桃花泣血記》原是「上海聯華影業」出品的默片，業者為了電影行銷，委請詹天馬和王雲峰這兩位大稻埕著名的「辯士」（黑白默片解說員）創作宣傳歌曲，在今日延平北路一帶沿街演唱，竟然大受歡迎。從此，以位於現在博愛路上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為首，開啓了臺語流行歌曲的黃金時代。陳君玉、鄧雨賢、周添旺、郭芝苑、李臨秋、陳達儒、楊三郎、呂泉生、張邱東松……等詞曲作者接踵繼起，創作了五百首以上的臺語流行歌曲，其中數十首如〔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更成為臺灣人共同記憶裡最親切最鄉土的歌聲。

本文就傳統戲曲音樂、西方音樂、流行歌曲等三方面描摹了日治時期臺北音樂發展的概貌，以此為基礎，本文真正試圖處理的，是多數學者不曾留意的一個面相——音樂臺北 vs. 音樂上海。就現有資料看來，姑不論日本在臺殖民的事實，自清領至於二戰之前，臺北的確承受了來自於上海的諸多影響，本文將舉出三點論證：其一、海派京劇（包括劇目、表演藝術、展演空間），其二、流行歌曲（包括旋律、唱腔、配樂），其三、跳舞。最後，本文並將由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頹廢之風來觀察表象上歡快而進步的「跳舞時代」，在「世事如何阮不知。只知文

明時代，社交愛公開」(〔跳舞時代〕歌詞)的歌聲裡，是否隱含著殖民地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像孤島一樣懸浮於無時間的廣洋裡」的流離失所？是否與隔海的「十里洋場」上因國弱民貧而歎息的中國知識分子有著異曲而同工的感慨憤懣？

怎樣「時代」？如何「跳舞」？《跳舞時代》這部紀錄片留給我們的「紀錄」其實還是很需要我們去深思驗證的，如何去追尋一個「持續跳舞的年代」更是我們最大的夢想與期待。